

創刊號

野百合

通訊

壓迫正在進行中



# 目錄

|                   |     |    |
|-------------------|-----|----|
| 發刊詞               |     | 1  |
| 九〇年代的學生運動         |     | 2  |
| ——回顧與展望座談會        |     |    |
| 反省「派系」本位思考        | 陳尙志 | 14 |
| 一場獨缺人民行動的鬥爭       |     | 17 |
| ——論所謂二次十改         | 侯念祖 |    |
| 從畫餅充飢到一無所有的基本工資調整 | 劉茂彬 | 24 |
| 反賄選的流行光譜          |     | 28 |
|                   | 郭紀舟 |    |
| 性不性由不得你           | 張芳玲 | 30 |
| 校園短波              |     | 33 |
| 編輯後               |     | 36 |

## 編輯委員：

王時思 史 哲 邱毓斌 邱花妹 沈發惠 侯念祖  
郭紀舟 陳尙志 陳政亮 蔡其昌 黃泰山 劉茂彬  
蕭武昌 (編委持續加盟中)

聯絡地址：台中縣龍井鄉新興路25巷2弄28號

TEL/FAX: (04) 6321740

郵政帳號：21190623 劉茂彬

封面設計：張 芳 玲

封底設計：郭 紀 舟

創刊號：1992年11月12日

※每份成本20元

# 發刊詞

在80年代，台灣社會展現了戰後以來未曾有過驚人爆發力，舉凡環保運動、民主運動、工運、農運、原住民運動從台灣各個角落，向統治階級進行了全面的挑戰、學生運動也自80年代中期開始，勃興於各大學校園中，進而在90年出現了“三月學運”、“五月反軍人組閣”、及91年“反政治迫害運動”等大規模學生抗議行動，在改革洪流中，我們受到啟蒙；在不斷地實踐中，我們持續成長。但是同時我們也逐漸發現，在未來與統治階級繼續鬥爭，積極進行社會改造的路上，仍有許多問題等著大家去討論、去克服，面對這種情形，我們決定發起這份〈野百合通訊〉。

取名〈野百合〉是因為三月野百合學運對我們來說，不僅是個人成長過程中不可磨滅的經驗，更是代表了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初步成果，雖然目前編委成員均已離開學運團體第一線的工作而成為研究生、社運或政運之基層工作者，但我們仍深以“野百合”反叛精神自許。

對於這份通訊，我們以為它應是一個開放的園地，應是作為運動的公器而存在的。就內容走向上來看，在此時我們認為下列四項是必須被討論的：

- 1.對過去運動的實踐經驗所作的反省和批判。
- 2.在運動日常運作中必須互相交換的資訊。
- 3.對於目前台灣及世界局勢的觀察與分析。
- 4.對於未來運動路線的辯証。

因此，〈野百合通訊〉的性格是實踐性的，它不是學術討論，也不是牢騷空話，而是與運動緊緊扣合，和現實息息相關的。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衷心地期望，來自反對運動中的實際工作者，特別是新一代社運、政運及學運工作者的意見能在此地交流匯集。我們認為，唯有深刻的反省與密集的討論，才能使我們在面對未來時踏出穩健的下一步，進而在台灣社會改造過程中，掌握到正確的方向。



# 九○年代的學生運動～

## 回顧與展望座談會

- 1986年 台大自由之愛
- 1987年 大學法改革促進會
- 1988年 「五、四」台北新公園學運晚會
- 1989年 「三、三一」工農子弟學費補助案
- 1990年 三月學運，台北中正堂
- 1991年 五月獨台案，台北火車站

今年，我們看到國民黨統治型態的改變；社會運動的低迷樣態、學生運動面臨轉型的新起點上；在高峰之後的學生運動要如何進一步突破現狀，本刊編輯部邀請各校學運幹部，討論此一新紀元的回顧與展望。本刊特此感謝「台灣教授協會」商借場地，此次座談會得以順利成功。

主持人：邱毓斌（清華社人所）

郭紀舟（東海歷史所）

參與者：許銘全（台大國際社）

卓玉梅（輔大台研社）

高偉凱（台大國際社）

吳維寧（輔大台研社）

楊偉中（台大大新社）

李宜恭（北醫人報社）

洪裕程（台大大新社）

張藝鴻（成大經緯社）

顧家銘（文化草山學會）

蘇育生（成大經緯社）

毛遠誠（成大西格瑪）

周嵩祿（東吳黑水溝社）

羅雅美（東海人間工作坊）

劉聖鴻（中興法商青年社）

黃士修（東海人間工作坊）



### 一、校園經驗的反省

許銘全：有三個問題需檢討：第一是校園問題普遍以議題的方式在開發，但如何長期經營卻不受重視；第二是校園文化面向，並非指小眾媒體或咖啡廳，而是放在都會區的文化現象來理解，如此才能真正觸及核心；第三點是聚點的擴展，包括學生會與學會，因它們較能與學生貼近，故是值得擴展的一條路線。

洪裕程：大新社以往以下鄉為主要經營方式，如到花蓮、雲林等地，透過下鄉讓學員與社會親近和關心社會議題。而近三年來，在社運的浪潮中，校園常被忽略，因此出現斷層。因此，現在來反省校園文化，除了持續關懷社會之外，重點應在開拓校園，並將社員拉回校園裡。

顧家銘：有關組訓上的讀書會和刊物是我們反省的重點，校園現已多元化，以往地下刊物的風光期已不在，故刊物的內容是否能與校園文化結合反倒更為重要。草山上二期刊物多涉及政治議題、反白色恐怖、與當時政治議題配合是有其成效，但卻不宜是常態。再者是新生招訓的問題，常面臨培訓方式強、軟上的兩難。

毛遠誠：談文化，是對政治議題的無力！在早期南方雜誌時，談校內白色恐怖是有其文化背景；三月學運後，學運被社運拖著跑，無法反映出時代文化，在政治上失向而轉回校園文化上。再者從二二八到今日，本土意識好像受到重視，反面而言是本土意識被運動拿來運用。因此讀書會、刊物現已失去吸引力，這非運動的問題，而是時勢的轉變。

黃士修：東海由於其地理位置上的特殊，在刊物上除了校方與學生的關



係外，主要的是如何將社會議題帶入校園，避免由地理上的封閉導致與社會的隔離。在組訓方面：先建立感情的連帶，再利用讀書會、刊物的討論和參與來確定其立場，最後才進入幹部（非學員）的培訓和分工。而近兩年才界入學生會，是由於其在東海的客觀環境上有極高的正當性，可配合組訓的過程，並將成效達到最大，也助於校內運動的推展。

李宜恭：三月之前，校園標舉校園民主的旗號；之後則以校園議題為焦點。例如董事會事件，這類議題不具明顯的意識形態，學生較能接受，動員狀況較佳。而學生會本身雖有其再生產的功能，但行政工作的繁重有官僚化的危機，所以說學生會有其正當性，亦有其束縛性。再者讀書會、刊物等老教材有突破的必要，以求活潑化。

卓玉梅：以草原、輔新、台研為主要合作基礎，分別負責不同的議題來開發校園，但這樣的組合成效並不理想，尤其在與國民黨控制下的學生會，相較之下正當性不足，故今年準備以社區調查為主，一方面開發校園議題，一方面培訓幹部。已決定不再參與學生會事務了。

蘇育生：各位所提的問題在成大都未曾發生，成大的學生較功利性，對社會議題冷漠，甚至連成立學生會的條件皆無。今年的工作主在內部整頓，由於曾幫人助選，但產生了選舉症候群，所以經緯這一年沒什麼活動。

周嵩祿：現在重心放在組訓上，如讀書會、刊物，希望能有一批運動幹部出現。黑水溝的前身是台研社，改名的意義在立場上已有明確目標與以往有差距，東吳的本部和區部文化差異很大，四個社團：本部台研、區部台研、蘇菲亞和大陸社，各自在議題上有所差異，合作並不愉快。學運份子也有參與學生會事務的人，但我則抱持著負面看法，尤於行政事務太過繁重了。

邱毓斌：問題很多，也提出不少方向，如社區調查、校園文化和學生會等，能否就作法上及背後所牽涉的想法，再深入的談各校情形？

李宜恭：教育部政策是輔導各校成立學生會，當其成立時，社團在校內搞議題的正當性就失去了。而經營學生會只要幾個幹部進入即可，不須耗費太多能量，它是一個很好親近同學生活的領域。

顧家銘：社團與學生會的關係，應該是“拿捏”。尤其許多抱着熱誠的同學進入學生會，而他們就是我們最好的吸收對象。在組織的考量上，如東海蕭武昌一個將退休的學運幹部去卡會長這個位置，他在社團內部已很難找到位置，去幹會長是個不錯的方法。

羅雅美：學生會之所以如此重要，是藉由正當性這麼高的組織、場域，將學生參與社會議題帶入校園來，在這點上學生會是個很好的切入點，尤其是理想性的堅持，如選觀團、反賄選這樣的議題。故參與學生會是經過細緻的評估和討論的，不可如此粗暴的來看待它。

## 二、校際串聯

許銘全：第一、現在多以臨時性議題式的結合，合作的客觀基礎多以人際關係來維繫。第二、從自由之愛到工農子弟補助案，其抗爭對象從校園到教育部，此事情非拿捏得很準，我認為須以校園官僚為鬥爭對象，再上

升到國家部門。而上升的太快，以我們現有的基礎並不多且多半是以前留下來的，使得大家在同一招牌下，自行其事。第三、對客觀社會環境認知有差距，故組訓的教材應有其共同基礎的部份。第四、目前議題式的聯合由於人員組訓方式各有不同，組織化程度不高，有其危險性。

顧家銘：三月的聯合似乎並不誇張，事實上當初就是要透過結盟形式的存在，來建立結盟的基礎，後者才是目的。若將學運視為民主化運動的一支，從三月到今年的憲政變化，學運卻無力參與，這是動員力的薄弱，如一年動員十三次，校際會議還是開不起來，這非結盟形式的錯而是動員力的問題。再者以我們和中央的經驗，非議題的結盟而是路線上一致共同行動的，是較好的模式。

李宜恭：我將全學聯看作長期藉着議題結盟的團體，但終究意識形態上並不統一，但這是當時環境的必須，現在的問題在於接合的要素為何？一直未被談及。再者全學聯多僅限於校際代表之間的聯盟，校內幹部未必清楚，我們須將各加盟社團視為各個具有不同性格特質的團體。最後我們新幹部未必要如全學聯這樣正式且規模龐大的組盟方式，如“野百合通訊”或區域性、非正式性的互動，在大規模政治議題消失的現在，不失為好方法。

卓玉梅：在談校際串聯時，常會忽略各校社團不同的發展及程度。如草原文學社在過去並未深入接觸政治議題，但全學聯所作的幾次政治議題的動員之後，對社團的發展元氣大傷。故多作校際間交流並從中培養新的議題及合作經驗。如高學費政策、北醫、東海都有經驗。另一方面，非正式的交流能提供結盟時更穩固的基礎。

劉聖鴻：對於相互不熟的社團來說，文化、中央的模式有困難，所以校際仍以議題模式較佳。校際間的結盟也未必正式，全面的組織方式，如以各校老幹作初步的集結，可從事意識形態的深化及交流。全學聯應強調全面的校際視野，而不侷限在校園的抗爭裡，這些事由老幹來作較合適，如“野百合通訊”。而議題性結盟給各校當政的幹部來作會比較好。

反核是議題結盟的焦點





楊偉中：全學聯組織對台灣學生運動來說，是否過於早熟？首先我們須面對各校發展水平不一致及各自運動計劃的差異。再者學運份子性格浪漫不適合組織化或去負擔全學聯這麼大的一個全國性組織。這和“環保聯盟學生會”或“全女聯”是不一樣。它把全國的學運組織試圖納進來，以台灣學生的組織性格無法勝任。至於議題結盟方式有二種：暫時性的如“全民反政治迫害聯盟”或“台灣學生教授制憲聯盟”議題結束就散了；另一種是一開始即因議題結盟，漸行組織化工程，我認為這是不錯的方式。另像“全女聯”等也是可以有生命力的方式。而全學聯仍須存在，如剛才劉聖鴻的說法，但不須花費如過去那麼大的力氣去經營，反應集中在共識的凝聚。

毛遠誠：缺乏對時勢的評估使我們一直在處理政治議題和扮演“危機處理小組”當中被局勢拖着走。全學聯對於參與政治議題的戰略並未在內部仔細討論過，持續下去我們會在運動中異化掉，組織癱瘓，變成聯誼性團體。尋找一些具廣泛性的議題能讓各校就地進行，以免如以往活動集中在台北，將中南部的人往上調的情形。

蘇育生：全學聯能否吸引除了學運以外的學生？其組織性對許多可能支持學運的人設限。我反對現在進行組織化，反倒贊區域小規模的模式，再進一步作大規模合作，如此才能吸引更多人，否則就浪費精力且成效不彰了。

許銘全：我們缺乏一個“校際視野”，全學聯或類似結盟團體在運動中是個“戰略高地”，但缺乏專業思考及經營。其次全學聯在一年之中，剛剛顧家銘說錯了，是動員十四次。不要談一般學生，幹部也會動員疲乏，不但未累積資源，反倒有“反動員”的效果。

楊偉中：全學聯是個“戰略高地”，但這並非用說的就可以，必須有校際思考，且在組織過程中，讓學員清楚的感覺到校際組織是有意義，必要的，這樣才會有堅實基礎。

羅雅美：我比較想從校際串聯的實際內容來談，如果校際間活動沒有校內堅實組織作為基礎的話，那麼這種串聯永遠是空的，不論在動員上、組織上都一樣。至於議題結合可分兩種：社會議題和校園議題。就校園議題而言，對校際串聯有很大的空間，可以透過遍地烽火的形式來進行，將這種議題散到各校去。另外常談到如何以這樣的學運整合形式能夠推動一個大的社會議題，取得學運的發展空間。這兩個議題都牽涉到一些問題，一是動員的問題，這是最基本最現實的問題，另一是誰來發動。其實這些牽涉到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對於議題的形式上缺乏想像力，不必老是想像三月或五月學運的大規模結盟，多元化發展是更為重要的，比如社區抗租運動，或前一陣子基客、宜客罷工，學生可以組一個觀察團等等都是很好的議題。

李宜恭：全學聯作為一個跨校團體，若要繼續存在的話，首先要知道現在我們還有多少資源可以運用、如何運用。其次是意識型態，雖不求完全一致，但必須具有相當的共識，各校如何由校內開始凝聚意識型態，進而推展到校際，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第三是組織化的問題，過程中我們必須要降其成本，避免過多的行政工作，而且大家必須接受組織化的過程中必定會出現核心，但這不代表我們就是菁英式的組織，核心的責任及工

作要清楚，這是過去全學聯校際會議所沒有作好的。最後，校內社團和校際組織事實上應是相輔相成的，但是過去並沒有建立起很好的機制去完成，這也是以後要注意的。

羅雅美：從三月學運到去年五月學運，政治運動風起雲湧，全學聯過去的作法是扣合在這段客觀環境來形成的，從現在看似似乎沒有什麼對錯的問題。今天我們常說運動不景氣，但是我認為景氣有景氣時的搞法，不景氣有不景氣的搞法。在這種情形下，採取區域性、零細化的校際串連，仔細考慮各校發展的特殊性，是有必要的，而且可以是校內社團行政工作及校內幹部的成長兼顧的串連模式。

楊偉中：我手上有一份韓國學運的組訓資料，看完我很感嘆台灣學運份子的組織水平，如果我們要從事校際串連，應該可以採類似的方法，幾個學校在一起好好地作一份學運的組織教材，作一個比較紮實的工作，從這些工作去交換意識型態，消除以前的歧見。



五月獨台案是政運、社運、學運的大聯盟

### 三、學運與政運、社運的對待關係

邱毓斌：因為時間上的關係，我們把第三及第四個題綱合在一起談。接下來我們請顧家銘先談。

顧家銘：過去學運中的老幹部在畢業後，已經開始投入反對運動中去工作，甚至有人也已成爲派系成員。這樣子就會碰到一個問題，在工作中要和學運界保持什麼關係？通常會演變成一種很惡質的代間矛盾。其實我關注的是他們和校園內的幹部的關係要如何處理。因為我們面臨到一個問題是：假如說一個老幹部現在在某人或某派系那做事，那麼是不是代表那個學校的社團就變成某人或某派系的資源？這樣的情形如何制度化是很重要的。像“野百合通訊”就是一個由老幹部組成的，我認為他們比較可能來處理學運與政運的關係，而不是透過議題參與來處理這樣的關係。

劉聖鴻：剛剛之所以會提由老幹部來作為校際結盟的主體，是基於去年的經驗。不管外面發動什麼運動，只要想找學生參與，就會找上“學生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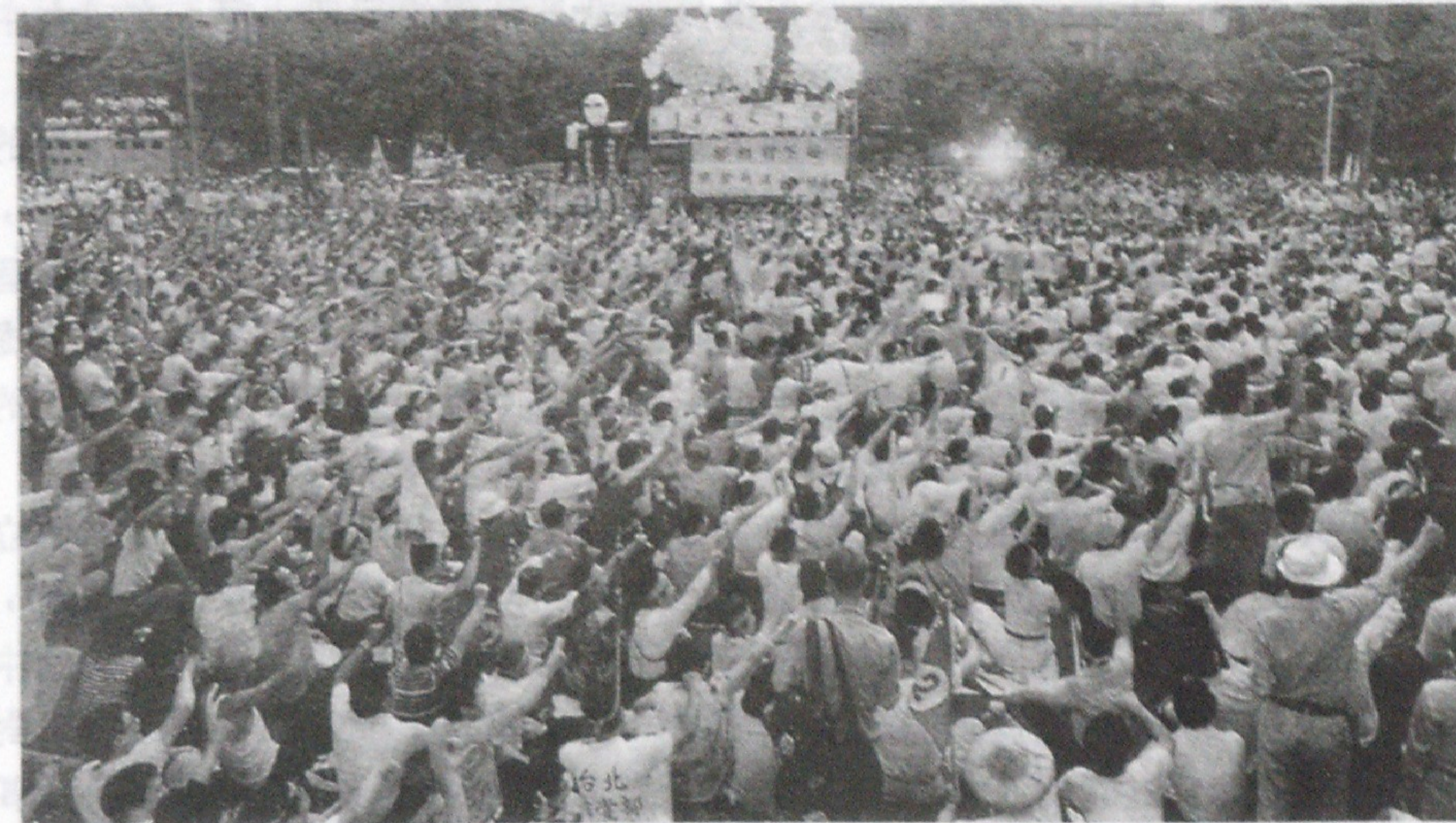
盟”的全學聯。但是我們並沒有在內部先談好。如果由老幹部來形成聯盟的話，因為資歷及其它原因，可以比較清楚地形成共同的看法，對於外在的環境比較容易回應。其實背後真正的問題，學運很難形成一個集體的意見。我提的那個意見重點在於，校際聯盟的代表和校內幹部的分工及分際要談清楚，否則常會發生校際的決議不拖校內社團出來作就作不了的情形，也比較不會說因個人接觸某一派系使得整個社團必須被拖著跑的現的。

許銘全：雖然學運的主體性及組織化都有被討論到，但是過去的運動模式，除了八里的十三行遺址搶救行動之外，學運和政運或社運的合作模式是不良的。在一些大的運動出現的時候，一些團體會要求學生應有行動，我們的行動判準是“考慮應不應該參加”，我們並沒有去發展出自己的路線及運動主軸出來。如果要求一個適當的合作模式，那必須扣回一個根本的問題，假如要發展社會議題，對於校園基地或學生運動有什麼幫助？但是過去我們對於與政運、社運的合作很少回頭想這樣的問題，反而在捲過去之後，焦點多集中在這個運動成不成上面。

毛遠誠：在過去的經驗中，學生運動還沒有擺脫掉三月學運之前的思考方式，就是把學生運動視為一種淳樸的、被社會期待的表徵，這樣的背景使我們在無社運或政運接觸時自主性較為缺乏或拒絕參與。在三月學運之前，和現在不一樣的是，當時學運有很強的理論指導，但是現在我們並沒有一套屬於自己的論述出來，而還是延用舊的思考模式，在面對急遽的社會變動之下，我們就很難去適應。因此現在的合作關係的意義多停留在感情的聯誼，培養合作基礎上面，更深層的思考就沒有作到，比如說民進黨作為合作的對象，我們就很少去談到民進黨在台灣未來的政治局勢中扮演的角色。



學生運動對民進黨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卓玉梅：我想談的是，在以前的政治或社會議題上的動員，不僅校際之間出現問題，也會使校內社團出現矛盾，包括對於議題、合作對象的選擇都可能造成社團內部的危機。（以下由於錄音帶模糊，無法整理）

羅雅美：各社團如何去對待地方的政黨活動。有一個重點是，我們如何在參與政治運動的同時，將資源有效地放回校內社團來。另一個重點是，在和地方社運、政運接觸過程中，我們可以逐漸地建立一套完整的論述，不管是對於台灣特殊的政治經濟發展，或是關於學運與社運或政運的對待關係。

郭紀舟：從去年國代選舉開始，有連續好幾年的選舉，而部分在場的同學或是老幹部都投入助選的行列，是否可以談談各位是如何詮釋的，或者談談各位對於學運份子參與選舉活動的看法。

顧家銘：大家可能會對文化草山的動作覺得很奇怪，分別有人到謝系、范巽綠、盧修一、勞動黨等處助選，其實這都是個人基於自我的選擇所造成的，換言之，社團對這種事的約束力非常小，也可以說是沒什麼規畫。這裏有個建議就是選舉時有去賺人家錢的，選完應該回來好好談談這個問題。至於已經不在學運中負責實際工作的人，出去助選是理所當然，而且多已和學運沒有什麼關係了，我覺得這其中的關係可以更進一步連結，以我自己為例，在助選時會針對對選舉有興趣投入，平時在學校中有自由派思想的學生，在助選過程中加以組織，以期他們在返回學校時能成為學生運動的成員。因此除了幫人助選之外，保有學運的思考進而對學運有幫助。

蘇育生：我們社團在參與選舉運動時，面臨到地方派系林立的問題，這使得我們很難去以社團名義支持某一候選人，今年我們決定以個人名義出去助選。出去助選時，最大的問題是對於社團發展沒有幫助，在選舉中獲得的組織經驗也不見得社團能適用，再加上助選的經歷使我們在校內易被其它學生貼上標籤，因此使得校內活動難以推展。學生運動是以學生身份的人來搞的運動，因此如果要使非學運社團的人來搞運動的話，學運和政治運動就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就社運而言，是需要有人長期去經營的。



如果學運是以關心的態度去接觸的話，看起來只是作秀而已。台灣學生運動中有多少人願意以後長期投入社運的行列中呢？在成大中，我看不到這樣的人存在。

許銘全：我必須向大家解釋我參與助選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經濟上的因素。另外，由於我選擇的是台中縣，這個地方不是都會區，那麼這地方上的矛盾及主要重視的事務是什麼，就成為我去助選的另一個原因。對整個社團而言，對於接連數年的選舉，我們的論述並沒有完整提出，比如說對金權政治的看法並不很細緻，因此我期望藉著助選而增加的認識能作為和社團互動的起點。

高偉凱：許多朋友都認為彼此都是左傾的，那麼從這個立場出發，勞資關係不知道是不是主要的矛盾，但顯然不是最激化的矛盾，那到底矛盾的雙方是什麼，其統一又是什麼，這答案不能在書本、校園中去找，只能到地方上實際去觀察。因此，我傾向把選舉當作一種下鄉，對真實的社會有更深入的了解，這對我們日後脫離學生身份之後所繼續從事的工作會有幫助。

黃士修：我對於學運參與助選工作這件事比較會從組織面來看，社團是最根本的據點，在去助選的過程中，如何使社團能獲得資源的累積，以便以後的人有比較好的基礎是很重要的。第二部分是幹部在助選中所接受的磨鍊，不管是許銘全說的對實際地方的問題，或是文宣工作等等，這是和校園工作不同的歷練。

周嵩祿：我們社團今年決定不參與助選。過去學長姊出去助選的經驗對於社團並沒有累積效果，在這種情況下，社團成員出去助選可能只是扮演勞力者的角色，主體性比較難以發揮。因此，在組訓工作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我們並不考慮到外面助選，如果因為人情壓力不得不去助選，前提是決不能影響社團日常運作。

劉聖鴻：我覺得學運幹部是政運或社運的預備部隊，如果一個人在學運時參與或聲援社運或政運，但是畢業後沒有持續參與，那是搞假的。所以我在看待學運幹部助選時，固然個人有所收穫，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對整個社團交代或詮釋這個助選的行為，一定要讓社團後面的人清楚出去參與政治運動的企圖及動機，以立下一個好的示範，因此我們社團是這樣的：出去助選的人不可以干涉社團內部事務，但是社團成員不管多低年級都可以質問助選者的想法和作法。這會避免因為某人到那兒去之後，整個社團被歸為某派系。至於談到校園群眾對於學運社團出去助選不支持或質疑，這個情形或許因地區不同而有差異，在台北比較沒有感覺，學運份子去助選反而要和非學運份子出去助選的行為作一明顯的區別。

#### 四、總結

邱毓斌：最後是不是請大家針對今天談這麼多的東西，各自作個簡短的結論。

羅雅美：我們常說由於這幾年台灣社會高度政治化，使得社運、學運沒有發展空間，這種說法面對這樣低迷的局勢，我們應有更高的自我期許及自我反省，學運幹部應發揮更大的創造力及想像力。

經驗及資源作很好的整理及規劃的時候，對外所作的開拓可能都是空的。另外就校際不管是聯盟或議題結盟，過去的溝通並不順暢，通常在溝通之前就已經有預設，在目前台灣學運人口就這麼多的情形是很不應該有的現象，可以談的空間還很多。

周嵩祿：台灣社會的矛盾面很多，我們可以去談的空間還很大，但是不應該只是空談，而應落實到實踐面來作，比如說，對於弱勢團體的分析及關心，應該展現為學運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才是。過去我們社團對於校際活動的參與並不多，這是我們這學期會去努力從事的一個目標。

蘇育生：學運如果沒有一個很強的校園群眾的動員基礎的話，現在我們談什麼社運、政運的參與都是惘然。我們強調應是其他學生是不是認同我們的理念，因此現在要作的工作是回到學校去組織那些可能支持我們的學生，而不是積極地向外拓展議題。

洪裕程：在談政運、社運參與的時候，會考慮學生群眾是否會認同我們，但是我覺問題應該反過來問：如何讓他們支持我們。像環保議題、原住民議題都是很容易被接受的，社服團、山服團的同學所具有的热情應該也會是支持我們的，但是這些工作我們都沒有作好。另外，政運或工運與學運的結合也是相當重要，我們必須尋求一個良性的互動模式，將這些議題推進校園，因為學生運動要改造的不只是校園而已，如何結合各校的经验將這方面的工作作好，是未來的重點。

黃士修：希望今天的討論是一個好的開始，而不是像過去零零落落的討論一樣。雖然今天的討論並沒有具體的東西出來，但是以後應該持續這樣的討論，即使是一些激烈的辯論也無妨，總是會有一些具體的方法出來。走這條路的人已經夠少，如果還忌諱去討論和思考，那我們還有什麼資







三月花開，  
花開之後呢！

毛遠誠：我們在面對現今的局勢，稱為“低迷”，但是自三月學運以來我們多集中在技術面上的討論，很少去討論局勢到底如何低迷？為什麼低迷？或者是台灣社會的轉型要轉到哪裏去？既然低迷了，那就讓我們先停下來對於客觀環境作比較清楚的認識。第二點，要去釐清學生運動在社會運動及政治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不管是下鄉或是助選，在過去均有清楚的理論意義，但是過去這麼作是對的，現在就可能要調整了，比如說下鄉實際接觸社會對現在校園群眾可能不是具吸引力的，我們必須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顧家銘：我非常在意校園戰線的建立，也就是以校園議題為主的運動必須要推展，過去一年這種戰線是被截斷的。另外，學運與社運的互動必須維持，甚至應建立起一個比較完整的互動模式。如工運，我們可以採取幫工會編會訊，只要有心接觸，應該不會找不到機會。第三，與政運的關係方面，我會比較強調我們的理想性格而比較不傾向去談策略性或現實性的問題。另外，我們開始要去思考台灣逐漸成形的兩黨政治，在這種關係底下我們要以一個比較長遠的眼光來參與政治運動。

劉聖鴻：學運的正當性其實來自於我們對於局勢的判斷及未來作法的清楚規畫，所以其實不用亟力求得校園群眾的認同，在沒有將自己所擁有的

格去組訓別人呢？

許銘全：不管是代間的接合要素或是社會條件的接合要素都有待溝通去完成。以往我們經常礙於學運之間的派系問題而避諱去談路線的問題，往後這方面的討論不能再迴避了。有人說學運目前是低迷的，我則說是沈潛期，正是要趁這樣的機會靜下來討論及重新調整，包括串連上的關係、方式和基礎，也包括和政運社運的關係的建立。過去的人有許多經驗，但是我覺得這經驗的傳承沒有作得很好。至於區域性的串連，我覺得桃竹苗區的作法很好，他們不先以議題結盟為主，而是在區域範圍先行了解、溝通，等到議題來了再互相支援，彼此的援助及結合所帶來的正當性，是我所謂校際串連組織是一個戰略高地的最大意義。最後一點要談的是，在談對校園同學作動員之後，必須先去了解他們，去弄清楚他們的腦子裏在想什麼，這個工作必須和運動的推展同時進行的。

高偉凱：目前台灣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的關係是混沌不清的，理論上社會運動必然牽涉到政治權力的爭奪，因此社會運動一定會是政治運動，但是我們需要對現實更細緻的分析，比如說18標是哪些財團在操縱，或者搞清楚所謂“中國國民黨”及“台灣國民黨”的物質基礎是什麼，這對我們學生或者左翼運動份子站在這樣的立場如何去運動是沒有幫助的。學生運動不僅從事校園改造工作，也必須在一個清楚的立場上對社會、經濟、政治從事改造的工作。

邱毓斌：今天這場座談到這裏告一段落，非常謝謝各位的參與。“野百合通訊”日後將會繼續舉辦類似的座談，並且誠懇地希望諸位若是對運動有些看法或是檢討，能夠寫成文章投稿到“野百合通訊”，使得在學運幹部或是反對運動基層工作者之間能夠達成彼此的交流，這是我們辦這份通訊的目的。謝謝大家。

# 11.12 工人鬥陣大遊行

## 修法修不好，全國大工潮

請大力支持!!





# 反省： ‘派系’本位思考

陳尚志

從1990年三月學運至今，學運團體做了些什麼？如果想自我辯護，那麼我們大可開列一份包括成立全學聯、進行組訓、反對白色恐怖……云云的清單；但如果想想我們累積了什麼成果以及回首看看我們的日常生活，將會發現：我們花費了許多的時間精神與腦力在重覆一個遊戲——“派系”互動遊戲。沈迷在這個遊戲的結果，是誤導我們思考的重點，以及更嚴重的，導致我們錯過深化與擴大學運的種種時機。衆所皆知的，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可以搬出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與功能來合理化過去的行為，但這不是本文所要從事的。在此，我們要的是自我批判，而非辯護。

我在派系的頭上加了括號，是因為它基本上是個虛構的、幻想的產物，我說我們沈迷於“派系”的互動遊戲，意思是說我們“假設”學運中有幾個不同的“派系”，然後為了一些種種高尚的目地而在其中大搞合縱連橫，促進學運的發展；然而當我們如是做的時後，早已忽略了真正發展所不可缺的深刻的討論與思考，只關注在各種“關係”上，所以我們是在玩一種本末倒置的遊戲。

說我們“假設”學運中有幾個“派系”，其實並不甚公平，因一般說來我們是確切地“認知著”學運中有幾個“派系”，並且我們也不是明知故犯，有一些客觀的事實與外在的影響促使我們誤讀事實本身。



所謂“台大”系統成員，鄭文燦

回頭看台灣學運史，不可否認地的確出現過派系分化（即88—90年的“台大”與“民學聯”），這是一次相關於人脈、資源、意識形態、運動路線的派系分化，然而經歷了三月學運風暴，漸漸地既有的派系消聲匿跡了，有更多的新學校加入，有更多的新幹部投入，所有的學運團體共同催生了全學聯。遺留下來的，只是頑固的歷史記憶，在這個時期聲中，暗地裡歷史的亡靈卻被召喚出填補心靈。原本，整合的是不同學校因背景不同時間不同而引起的差異、老幹部新幹部經驗的傳承與差異，學運社團與因三月而投入學運的新成員的差異，但是當這些具體的差異不慎穿上“派系”的外衣後，我們的思考與行動就開始以衣冠為準了。的確，我們仍在整合，但整合的是衣服而不是真實的人了。當我們看到的是虛幻的“派系”時，真實的問題就被掩蓋起來了。

更嚴重的是，當“派系”的概念成為思考的主軸時，許多無謂的擴充與衍伸就應運而生。當然，時逢反對勢力既有結構的日漸解組，各路人馬爭鬥現有資源，當這種資源爭奪戰被錯誤詮釋為“派系鬥爭”或“派系重組”時，我們也就理所當然地延用這個概念來看待學運內部的種種關係。“關係”變成了“派系”，國王穿上了新衣。台灣學運內出現了n個“派系”。

事實上是一些既有關係的小團體，在我們認知下變成了是“派系”，於是整合差異變成了“派系”間的互動遊戲，而我們在其中卻樂此不疲。

我有必要更清楚地說明派系。實質上每一個黨內與政治上的派系，是擁有一組意識形態、清楚的行動目標與行動策略、以及自己的人脈網路、組織與收集資源的方式的。因此派系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的，因為它們的利益互斥與行動方略不一致；即使在合作的狀態下，彼此的利益與目的也是清楚的。因而明顯的，學運內部的“派系”是



相當可笑的，我們看不到任何關於意識形態的爭論，看不到運動路線運動策略的提出與差異（或者更殘酷地說，根本沒有運動路線策略可言），只看到不同人際網絡的分歧。

但不容置疑的，這種遊戲相當有趣。把別人看成不同“派系”，內心視他人為假想敵（雖然提不出什麼路線上的爭議），日日處理一層又一層的人際關係，就好像搏奕迷，能夠忘記外在環境而廢寢忘食地自己和自己下棋。君不見我們堅守“先做朋友再做同志”的青年守則，雖然朋友到同志之間遙不可及；君不見每月一次關於誰說什麼誰對誰說的所謂“羅生門”大戲，早已成為運動的重心。

我們須提醒，“派系”互動遊戲帶來的危機，絕不只是暫時停頓學運的擴展，事實上這個遊戲的實踐意義，已將我們和我們一向所批判的反對運動政治邏輯之間，形成了一種“共識效果”。只要我們一進入這個“派系”思考的遊戲，我們就增強了反對運動的政治邏輯，將忘記、解消我們對此邏輯的批判關係，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就認同了這個邏輯，這對曾經立志矢言改造台灣社會的我們，才是最可怕的危機。

也許我們並非完全地捲入這個遊戲，也許我們或多或少患了這種思考病，但無論如何，要求立刻放棄“派系”本位的思考方式來解決問題無異緣木求魚。但在我們墮入這種細微理性時，尋回舊有的激情與熱情無疑是最必需的。也只有在運動方向與運動策略的認真討論與爭辯上，我們才能檢證“派系”是否存在。

歷經三月學運，原本因人脈、資源、意識型態的派系分化已然消亡！（校際會議）



## 一場 獨缺 人民行動 的鬥爭



二次“塗”改，好好好！

## 論所謂“二次土改”

侯念祖

楔子

所謂的“二次土改”戲碼——後被“塗改”為稅制變革——正值落幕前的高潮戲。正如同臺灣的連續劇所慣常具有的陳腔爛調的結構一般，這場戲被觀眾所納入認知意象中的，也是一場是非分明、善惡清晰的正邪大決戰；所不同的只在於，落敗的竟是代表正義一方的男主角——王建煊，拏著改革的裏劍，披著唐吉訶德的外衣，即將自沙場上帶著觀眾的嘆息隱入幕後。

另一方面，這齣戲無論如何也參雜了一些懸疑的情節。尤其是當和王建煊信仰同一個上帝的李登輝躍上舞台，扮演著似乎中立但實質偏袒的少林寺高僧仲裁角色時，他以往所塑造的道德形象，必定讓一些觀眾開始懷疑自己的認知。而號稱反特權、反金權的民進黨，在這件事上卻表現了完全相反的立場，最後並化為“反王”，同時進一步





“反郝”的行動。

而且，不幸地，這齣戲卻是全國聯播，作為觀眾的百姓，連選擇頻道的自由也沒有。同時，更不幸地，在觀賞這齣戲時，觀眾們並非如同往常般坐在電視機前作為一個全知的角色而存在，我們不清楚整齣戲的來龍去脈，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甚至連演出的演員有哪些人，我們都所知有限。

然而，不管這是一場什麼樣的戲，我們並不願只作為一個觀眾，或最多只是一個“入戲的觀眾”。但是，無論我們意欲跳上舞台由自己來演出也好，或是甚至變成編劇、導演也好，搞清楚這整齣戲所有角色之間的關係，卻一定是瞭解我們自身將能夠扮演何種角色的必要前提。

那麼，所謂的“二次土改”究竟是怎麼樣的一齣戲呢？戲中的各個角色又為什麼及如何互相角力著呢？

在此我必須事先聲明，這篇評論並不打算進行政策分析。對於作為堅信行動與鬥爭乃是歷史與社會變遷的動力來源的一個運動者而言，任何的政策分析都將使我們淪入無窮無盡的技術爭辯之中，而最後，所有的社會政策都又將只成為專家與政客們的專利。然而，這並不是意味著我們只是一群盲動的好戰份子，因為在行動與鬥爭的過程當中，我們仍遵循著對於一個信念的堅持，那就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 二次土改之始末

“二次土改”（或是所謂的土地買賣按實價課稅）早在民國七十九年就已由財政部提議實施，但是當時卻因內政部反對而未定案。到了民國八十年中，財政部再提出土地買賣在一定金額、一定面積以上者按實價課稅的方案，同樣的仍因內政部尚有異議而未決。民國八十年底，因逢二屆國代選舉，行政院長郝伯村指示延後三個月再議。到了民國八十一年初，財政部提出恢復課徵土地交易所得稅方案，取代土地買賣按實價課稅方案，結果內政部仍舊極力反對。但隨後所召開的全國經濟會議作成採行土地買賣按實價課稅的結論，此時，財政與內政兩部也逐漸達成共識。同年三月，行政院「當前重要土地問題專案小組」作成決議，土地買賣按實價課稅，並請內政部納入修法，而內政部也加速平均地權條例的修法速度。後來，內政部與財政部也達成共識，即以自用住宅用地為課稅標準，凡自用住宅土地於五年內買賣，第一次按土地公告現值課稅，其餘按實價課稅，非自用住宅用地則皆按實價課稅，而這時也出現了地主與財團的反對聲音。到了八

月間，國民黨中常會中部份中常委反對土地買賣按實價課稅方案，認為本案將“打擊企業投資意願，且擾亂經濟秩序”，但內政部與財政部仍重申支持這個方案。但是八月至九月初，行政院連續三次審查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案時，卻迴避了土地買賣按實價課稅這個條款。九月五日，內政部長吳伯雄宣布，由於技術問題無法克服，決定土地增值稅制度仍以公告現值課徵，一舉推翻了土地買賣按實價課稅的方案。

至此，全臺灣乃陷入了一片混亂的爭論之中。吳伯雄始終以技術問題作為反對的理由，而王建煊則強調租稅的公平正義原則。而財團則大肆撻伐王建煊，並扣上“共產黨”的高帽子。但學界也發起簽名運動支持財政部的方案並赴行政院請願。各式的所謂民意調查也紛紛出籠。九月中旬，李登輝於南部宴請國民黨籍國代時，也表示對於土地買賣按實價課稅的反對意見，並認為此案若經實施，受害最大的不是財團，而將是小地主與“擁有祖產者”。民進黨也在立法院提案醞釀罷免王建煊。而各級地方議會也接二連三的發起“倒王”運動，並以休會表示抗議。而十月初立法院開議後，郝伯村乃於總質詢中表示，並沒有所謂的二次土改，所謂的二次土改“完全是少數有心人士所創造出來的名詞”。十月六日，李登輝與縣市長餐敘時，更公開表示反對財政部的方案，並間接的嚴厲指責王建煊。隔日，王建煊提出辭呈，其間雖經李登輝“挽留”，但其仍於十月底掛冠而去。一場稅制改革到後來卻成為“李郝之爭”、“主流與非主流之戰”，甚至變成“外省人鬥爭本省地主”。

### 二次土改的真象

首先，第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到底有沒有二次土改？其實，這已經是非常清楚的了。這場遊戲從頭到尾都只有一個主題，即是土地增值稅的課徵方式。當然，我們並不排除王建煊的方案相對而言較具進步性；但是，僅僅一項土地增值稅課徵方式的變革，離真正的土地改革還遠的很。一個真正的土地改革除了土地稅制的變革之外，還應該包括土地利用、國土規劃政策的改變，甚至包括土地所有權的轉移。換句話說，一個徹底的土地改革，應該是將多餘的、非生產性質的土地自私人手中釋放出來，並透過國家政策進行土地所有權的再分配。然而，僅王建煊的這樣一個不完全的土地稅制改革，就激起了土地資本如此強烈的反彈，二次土改在現階段的臺灣簡直是緣木求魚，徒增人民的希望而已。

郝伯村說的對，根本沒有所謂的二次土改。但是，他只說對了一半！因為，這個名詞並不是他眼中所謂“少數有心人士”所創造出來



的，而是那些不敢輕易捋其將軍虎鬚的新聞記者所寄望產生出來的。郝伯村罵錯人不是新聞，但有趣的卻是，從八月喧騰至十月，二次土改這個詞早已像郝伯村罹患帶狀疱疹般地人人盡知了，他又為什麼不像當時立刻透過媒體說明帶狀疱疹不是疱疹般地，立刻說明沒有所謂的二次土改。

郝伯村在其閣揆位上的統治風格，除了在一般的高度政治性的議題上採取毫不留情蠻橫的自以為是的高姿態之外，對於一般相對於人民日常生活的議題，則是盡量透過媒體型塑他果決、正義、維護百姓生活的可信賴形象，企圖號召人民對他的支持；然而實質上除了鞏固其本身權位外卻什麼也沒有作到。而二次土改（雖然是虛假的）原本是一趟正當性極高的順風車，若搭乘順利，自是一項值得大肆宣傳的政績。然而，車子尚未坐到，就已掀起漫天風暴，強行搭乘卻恐有翻車之虞。最後，只好理不直氣更壯的露出其狐狸尾巴，還忿怒的指責別人為什麼沒有看到他的尾巴！

二次土改是虛構的正義，已經十分的清楚了；然而，這個虛構的正義，卻引來了一場真實的鬥爭，終於使得它虛構的來，也虛空的走了。

### 一場一面倒的鬥爭

財政部王建煊的土增稅方案，引來了土地資本對他的圍剿，對於嗜食土地暴利習以為常的這些財閥們，這是必然的反應。但是，他們是怎麼成功的將王建煊踢下馬來的呢？這中間曾經出現過同等有力的反對力量嗎？

其實，很清楚地，在這場鬥爭之中，財團的利益乃是以李登輝作為他們最大也最有力的代理人。

從李登輝位居九五之後，很明顯的，他即拉攏大資本家們作為他權力的穩定性基礎來源之一。換句話說，他開始將國家機器帶向成為資本的統治工具。不管這中間是否存在著所謂的相對自主性，臺灣的國家官僚體系的確要比以前更為接近資本家的利益。然而，他也知道，赤裸裸的代表資本家的利益對於他慣常的道德長者形象並沒有什麼好處，於是拉出所謂的小地主、農民以及擁有祖產者作為其盾牌，並炫耀其農業專家的知識背景，企圖掩蓋其真實的利益代理人面貌。

姑且不論李登輝事實上乃是代表大土地資本的利益，然而，其拉出小地主、農民以及擁有祖產者作為盾牌來保護大資本的利益，卻真的能夠具有說服力嗎？其實，只要以土地改革的目的或原則作為判準來檢驗，就可以看出李登輝此舉的滑稽。

如果土地改革是為了有效的利用土地，並藉此達成土地利益的再分配，那麼，擁有生活或生產所需之外多餘的土地的小地主、農民或擁有祖產者就能夠被免除於此改革的範圍之外嗎？答案應該是很清楚的。如果小地主、農民或是擁有祖產者，其持有土地的目的也是為了自土地交易中獲取鉅額利潤，那麼他們的土地自應也被列入改革的範圍之內，並不應有擁有土地大小或來源的差異考慮在內。

當然，李登輝此舉只是為了掩飾其利益代理人的面貌，以及國民黨無能真正進行土地改革的歷史包袱。國民黨與財團及地方土地資本（也就是地方派系）的關係由來已久。藉著國民黨政府土地政策的廢弛以及特許，這些土地資本早已自土地炒作中坐大，並逐漸擁有了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國民黨再也不能像五〇年代時因為與地主們之間並無利害關係存在而順利的進行其土地改革政策，除非國民黨已經厭倦了其作為執政黨的地位。



吳伯雄堅持和  
財團站在一起

如果在這場鬥爭中，國民黨和土地資本之間的關係如此的密切而明顯，那麼為什麼一向標榜著反特權、反金權的民進黨卻不加以撻伐，反而也同樣的發起“倒王”的旋風呢？



「嗯！塗改是一項技術，  
政治也是一項技術，  
政治跟塗改有沒有關係呢？」



其實，雖然國民黨和大資本間的關係如此密切，但是民進黨也極於拉攏小資產者的支持，以維持其與國民黨一大一小分庭抗禮的態勢。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民進黨在事實上是比李登輝更真實的在意小地主們的利益。同時，民進黨其本身的力量，並不足以與國民黨對抗，因此，對民進黨而言，催化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就成為較簡單而能收效的政治策略。所以，民進黨的“倒王”是為了“倒郝”，是為了挑起國民黨內主流與非主流的鬥爭，以期望能在年底的立委選舉中坐收漁利。而所謂的公平、正義原本就不是政客的最終關懷。

那麼，在這場鬥爭當中，是否曾出現足以和土地資本對抗的力量呢？如果沒有，又是為什麼？

在臺灣，當國家的性質愈來愈接近資本家的利益時，在所有的行動者中，最有力的應該也是來自於資本家這個階級。同時，正如我們所知的，資產階級並不是所謂的鐵板一塊，在這個階級內部也有利益衝突存在。而且，照理論上來說，在資產階級內部，製造業資本和土地資本彼此之間的利益應該是互相矛盾的。因為，土地資本對於土地的投機性炒作將會引起土地成本的上漲，進而導致製造業資本的產品價格上漲，而減弱其市場上的競爭力，降低其利潤。同時，由於土地價格的上漲，製造業資本為了支付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也將增加，也

直接導致了其產品成本的上漲。

如果製造業資本和土地資本之間的衝突是這麼的明顯，那麼，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這場鬥爭當中，為什麼不見製造業資本出現擁護王建煊的政策呢（除了統一企業曾表示過口頭上的支持）？這可能的答案有二，一是他們不再在意臺灣的投資生產環境，一是他們反而和土地資本一樣擁有相同的利益，甚至他們也成為土地資本的一員。

對於第一個可能答案而言是非常明顯的了。臺灣的產業出走早已成為一個趨勢，一旦他們選擇了中國大陸或是東南亞作為新的投資據點時，臺灣的設廠成本便不再是他們所關心的了。甚至，在出走前高價出售其工廠用地，又可在臨走前大賺一筆，何樂而不為呢。然而，第二個答案也是有可能的。作為一個資本家，追求其個別的最大利潤是最直接而明顯的需求，如果土地交易能讓他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大的利潤，又為什麼不去追求呢。土地價格上漲對於長期投資環境所造成的不利影響並不是每個資本家都有洞見而能預期的，他們要的是眼前的利潤。況且，又有國外其他的地點作為投資的替代選擇地，臺灣的投資環境如何對於他們而言已經不再是那麼的重要了。

可憐的王建煊，他所面對的竟是一場一面倒的鬥爭！

### 人民作為唯一的改革力量

在這場稅制改革的鬥爭當中，在舞台上張牙舞爪的全都是統治階級的成員——國家管理者、政客及資產階級。我們並未看到人民在其中扮演任何的角色。唯一有的，只是一個個的民意調查中被數字所代替了、沒有臉孔的虛幻的人民。

然而，這場鬥爭最大的輸家並不是王建煊，卻是從頭到尾未曾實際出現的一般百姓。因為，惡質的土地投機炒作影響最大的就是一般百姓及其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

但是，自憐自艾並不會換來國家的慈愛與資本家的同情。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所有的權利都是靠著血和淚爭取來的。如果，在歷史的舞台上，我們總是缺席，勝利的宴席上也將永遠不會擺上我們的位置。如果，我們不涉入這場鬥爭當中，所有的政策果實也都將無法為我們所享有。

記住，國家並不像父親般的仁慈，資本家也總是嗜血的，只有我們才是最忠於自己的，也只有我們才最具資格為自己的需要發言。我們不需要代理人，我們也沒有真正忠誠的代理人，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成為戰鬥的個體，為真正的公平、正義而戰。

起來吧！該是我們行動的時候了！



從  
畫餅充飢  
到  
一無所有的

# 基本工資調整

劉茂彬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今年五月份，在院會中提出基本工資調整案，擬將基本工資由現行一一、〇四〇元調為一二、七二〇元，即每日為四二四元，每小時為五三元，調幅為百分之十五·二。隨即引起經濟部以調幅太高，將會引發預期性物價上漲，造成通貨膨脹，導致投資意願低落，加速投資環境惡化，而影響整體社會經濟的健全發展等理由大力反對。之後，全國各工、商業公會團體亦紛紛發表聲明，支持經濟部的看法與立場。勞委會則強調，經濟發展要在健全的基石上，即勞資關係必須和諧，勞工權益要得到全面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也應適度伸張，而主張基本工資調為一二、七二〇元，並認為基本工資的調整不會影響物價或增加營運成本，妨礙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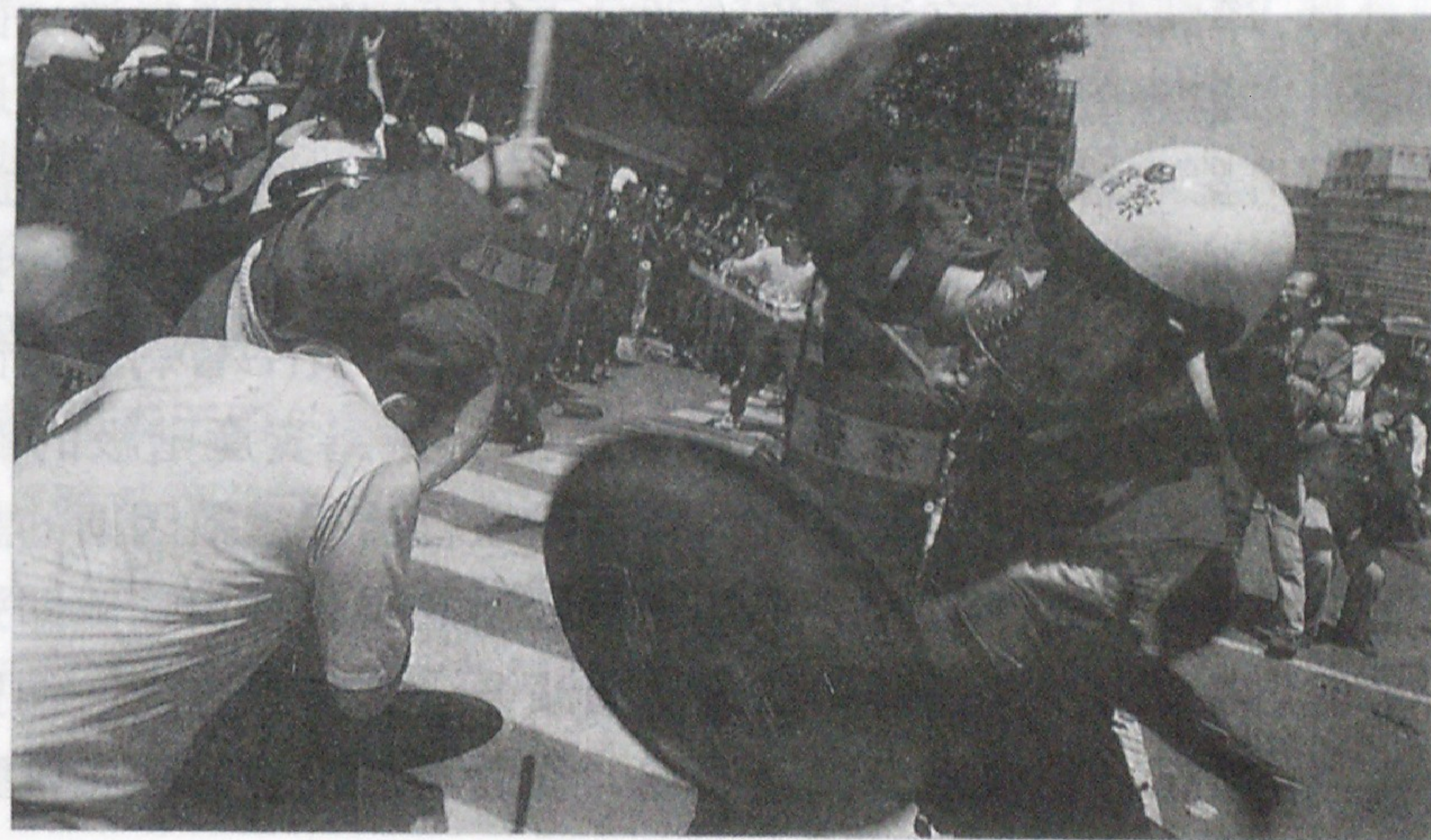
由喧騰一時的八十一年度基本工資調整來看，勞委會和經濟部，在形式意義上，分別代表勞方和資方的立場和利益，在實質上，卻同屬國家機器的統合統治部門，兩者對基本工資調整，由一開始各自堅持立場，針鋒相對到彼此妥協，各退一步，由原先調幅百分之十五·二降為百分之十二，終告塵埃落定。

觀照過去三年基本工資之調整，調幅在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三，相較之下，今年調幅並不高，卻特別引人注目和爭議。基本工資的訂定及計算方式，其實是反映着一定的歷史結構因素，同時隨着歷史結構的改變而逐漸調整。雖然，基本工資的訂定及合理性，目前在世界

各國仍存在不少爭議性的看法和辯論，然就台灣發展的意義而言，自勞動基準法將基本工資列入法定條文後，即象徵着國家機器的公權力將透過勞基法介入勞資雙方議定勞動契約過程，規範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因此，基本工資調整的確定性與合法性已無庸置疑。

但在調整基本工資實際過程中，所引發的幾個爭議性問題，卻令人懷疑，果真如勞委會強調，為了保障勞工基本權益而力爭到底，或者是如經濟部信誓旦旦，為了提振投資意願和降低失業率而誓死捍衛。到底基本工資調整，勞動者真的是受益者？或是基本工資的調整對一般的勞動者一無影響，祇是緩和國家機器內部的矛盾而已。尤其是站在勞動者的立場，如何面對這些爭議性的問題，提出自主性的看法和理解，進而爭取勞動者的階級利益，和解讀國家機器的統治密碼。

基本工資不同於一般工資即所謂的平均工資，依照「基本工資暫行辦法」，所謂的基本工資是以「計算工人家庭成年男女各一人的生活費」，即一家二口的生活費用作為標準，如按照辦法所定的基本工資，我們可以如下地解讀基本工資的意義：基本工資無非祇是為了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與獲得，因為勞動力的再生產可獲得，必須透過最低生活資料形式的保障，亦即基本工資提供的祇是讓受薪勞動者第二天仍有體力再回到勞動場所工作。以台灣目前實際受薪而言，一般工資即不只工資為基本工資的二～三倍。因此，就生產勞動和價格關係來看，基本工資已失去作為勞動媒介的真實價值。就統計而言，全國八百萬以上的勞動者因基本工資調整而受益者，約佔三十萬人左右，即實際受益者所佔比例在百分之三以下，而這百分之三的勞動人口絕大多數為邊緣性勞工，即所謂的剩餘勞力，外籍勞工或者剛進入就業市場的勞動人口。





基本工資既然已脫離作為生產勞動體系中的重要媒介，為何仍然被列入勞基法，並逐年調整，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解讀勞基法所隱藏的密碼。首先就統治意識型態而言，基本工資的法定化與法制化涉及國家機器統治的就業政策。基本工資的制定，不但是世界潮流，同時也保障最低收入人口的生活資料取得，提昇消費能力進而帶動經濟成長，並且符合社會正義原則，基於上述的現點，以代議民主國家的統治基礎，必須創造人民意識型態的支持，因此，國家機器有必要對其施政的就業政策作宣誓性和合法性的規範，勞基法列入基本工資條例即基於此項認知和實際需要。然而，基本工資引起爭議恰恰說明其本質矛盾性存在，就歷史條件而論，勞基法的制定，通常是出現在市場機能發達的國家裡，作為勞動生產重要條件的基本工資，依市場機能論之，勞力價格即工資，亦應視為一廣義性商品，既然勞動價格為商品，就應由市場供需自行決定，而勞基法透過公權力介入勞資契約的市場機能，必然顯露其本質矛盾性，所以，基本工資是否應以勞基法中之規範而逐漸調整，一定遭受質疑。

基本工資雖然無法消滅其本質矛盾性，但就國家機器統治的運作邏輯而言，卻有其存在之必要性。基本工資調整爭議中唯一沒有爭議的就是，透過基本工資的調整，勞保費用收入大量增加。據統計，今年基本工資調整後，在保險費率不變情形下，預計將近三百萬人的保費要提高，因此，每年勞保將可增加一百億元以上收入。依照勞保條例，目前勞保最低投保薪資是依基本工資分成四級，最低一級為一萬一千零四十元，依次為一萬一千四百元、一萬二千元，最高一級為二萬八千八百元。基本工資調為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五元，前三級投保薪資必然隨之調整，每年增加的百億元以上的勞保費用，對每年虧損近千億元的勞保而言，未嘗不能緩和勞保赤字的加速惡化。況且保險費率調高，在立法院政治考量下年年未能通過立法，面對全民健保即將開辦和保險財務日益虧損的情況，調高基本工資以增加保費收入成為國家統治機器在解決勞保財務黔驢技窮後唯一的定位。

基本工資調整爭議中，經濟部和資方代表，包括各種全國產業工會及部分御用學者，強調調整基本工資，會刺激物價指數上漲，因為不利投資環境和降低投資意願。做為資產階級的資方代表和部分學者，似乎已忘記了近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因斯的諄諄教誨，熟知現代經濟運作的人，都知道凱因斯的現代經濟理論即強調提高消費意願來刺激投資意願和創造就業機會。工資調整後，消費能力和意願隨之提高，刺激經濟流通領域，從而增加投資意願和帶動經濟成長。但就

調整基本工資的事實而論，基本工資的調整，對一般勞動者根本毫無影響，因為基本工資調整後，受到影響的是邊緣性勞工，這些低收入勞動者本來就屬於低消費能力，甚至是缺乏消費能力，由此而論，基本工資調整後，消費能力不會提高，對物價影響也是微乎其微，唯一影響的是雇主必須付出更多的保費，這點代表資方的產業工會以及部分御用學者和經濟部是相當清楚的。因此，抗拒基本工資調整是必然的。再者，從理論上或實證上而言，通常工資調整都是在通貨膨脹之後，因此，把基本工資調整說成是物價指數上升的因素而非其結果，是資產階級和其代理人移花接木，嫁禍於人的手法，如果不是這樣，每年軍公教薪資調幅都在百分之六以上，而受影響的是全國二百萬以上的軍公教人口，才是刺激通貨膨脹最大且制度性的罪魁禍首。資產階級和其代理人不追究及此，卻嫁禍為數僅二、三十萬的邊緣性勞動人口，其道理何在？蓋因軍公教人口的最大雇主是國家機器，而國家機器是透過稅收，吸納一般人勞動者的勞動所得，並不損及資本家或工廠主的私利，至此，經濟部、全國各產業公會和部分學者專家的用心已昭然若揭。

基本工資調整過程中，勞委會和經濟部，從一開始針鋒相對，到轉為各自妥協，作為一個勞動者如何去解讀這個轉變過程。依照國家機器統治運作的邏輯而言，這樣的轉變不僅沒有矛盾，恰恰相反，顯露出國家機器統治的多重本質。國家機器能夠執政下去，不僅需要具有強制性的統治部門，更需要有意識型態統治部門，兩者缺一不可。尤其在現代民主國家裡，雖然行政機構法院和監獄依然執行其強制性統治，而軍隊已漸漸失去作為統治部門的一環，但經濟或生產關係和生產條件，已慢慢上昇為強制性統治部門，因為在資本運作的邏輯中，個人或是個別勞動者已無法從經濟強制性的壓迫中逃逸出去。而為了掩飾經濟部門強制壓迫的暴力本質和真象，國家機器除了擁有強制統治部門，更需有意識型態統治部門互相配合，勞委會逐漸在國家機器中取得掌控生產意識型態的位階，因為它一再告訴勞動大眾，勞委會是與勞動者站在一起，為勞動者爭取權益，祇是勞委會的手中缺少致命武器，因此力量很小。

從基本工資的調整，作為一個勞動者必須體認到國家機器的不同部門，雖然運作方式有別，但目的卻是一致的。因此，不僅是邊緣性勞動人口成為制度下受害最深的一群，一般的勞動者亦是受害者，因為基本工資的調整對所有勞動者，一開始是畫餅充飢，到最後是一無所有。



# 反賄選的流行光譜

郭紀舟



李登輝到底承諾了些什麼東西？

10月22日，李登輝的神格魅力又再上昇了一層，發起「乾淨選舉救台灣」的六個民間團體：新環境基金會、道德重整協會、生產力戰略雜誌、好女與兒童安全保護協會、殘障聯盟、愛心服務推廣協會等，要求全島最大賄選團體——國民黨的頭子，簽署反賄選活動。以「我家不賣票」口號，強調個人內在道德的形象，進行社會淨化的反賄選活動。然則賄選有其結構性歷史，並非如此政治性簽署、背書，便可完成淨化台灣社會的賄選行徑。

台灣，作為代議民主陣營中的一員，其選舉過程中一直存在著光怪陸離的模式，賄選一直是最被各方（包括各政黨、候選人、媒體、民衆）所咒罵的病態現象；但弔詭的是，它卻也是最禁得起歷史「考驗」，而持續存在於每一次的大小選舉中，賄選的結構性因素在於：國民黨企圖靠選票得來的「多數決」，作為統治工具的正當性依據，且為了維持選舉的勝利，國民黨自必與地方派系、財團維持一利益交換結合的形式，例如讓地方派系經營公車、農會、青果社。相對於地方派系的政治人物言，要能獨得黨中央恩准的經濟利益，則必須盡其

所能的配合選舉人頭的控制，進行「多數的」動員力量。

因此，在選舉獨特的目標高於一切的情況下，各種污穢的選舉手段便脫蟬而出，賄選便是最為普遍、粗糙與赤裸的選票獨取方式。雖然，在形象上，國民黨及其候選人也言之咄咄的反對賄選，但是，在那光線照不到的地方，這樣的金錢交易卻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並且不侷限於國民黨的候選人。再加上司法裁判部門根本無力對候選人及其政黨施以法律壓力，整個政治體制中「應該」保持中立的司法及調查單位，便成為黨機器的一環，司法也推動了賄選的形成。

在此一結構性理解下，賄選不可能被禁絕，更可能被安全保護下進行。李登輝的這場神格秀，只不過再度現出「不可能的承諾」來欺騙人民。去年郝伯村下令教育部動員五百萬學生反賄選後，今年則由李登輝親自演出「淨化選風」。李登輝所簽署「反賄選」的「救台灣運動」，使他罩上了倫理道德純正而崇高的光環，其所代表的黨機器利益中心，掩蓋了黨機器與地方派系的利益交接。使得「反賄選」成為國民黨道德形象化的工具，加上由六個民間團體的政治背書，國民黨在這場秀裡已搶下「正義化身」的招牌。反賄選的指標，不再指向候選人及黨機器，而指向人民本身，要求人民用「我家不賣票」來「救台灣」，模糊化站在正義立場反對的對象，反而該淨化的不是國民黨本身，而是淨化人民自己。人民被「原子化」分化為道德不純正的孤立個體，社會賄選歪風變成由人民造成。國民黨不僅逃脫罪惡的淵藪，更順利的利用唯心且原子化的道德指標，打擊反對運動陣營的鬥爭策略。

反賄選本該反對利益交結的政治權力交易行為；然而李登輝作為道德象徵的神，企圖將所有想要（或覺得應該要）反賄選的人民、團體，置於其「光環」旗幟下。在賄選的結構性因素沒有被清楚的展示下，且國民黨搶下「反賄選」的政治招牌後，「反對」的客體對象被轉換成人民主體，「反」不再是人民主體正義的化身，「反」成了流行化口號，既之庸俗化的打擊反對陣營的戰鬥路線，正義象徵已被「神格秀」給犧牲掉了。反賄選的流行，相對地正當化賄選的熾熱流行。



# 性不性由不得你

## —從性騷擾談起

張芳玲

無正當理由對他人之身體、心理造成侵害或不自由的行為是一種犯罪行為；而男性為求得其一方性意之需求，並以身體、語言或其他方法，非經同意而加諸於女性身體或心理之舉動，竟稱之為性「騷擾」。將此行為「除罪化」的結果，使得性騷擾的定義曖昧不明，並易使人個別化的來看待它，因此它的結論通常是道德淪喪、不解風情、開玩笑或誤會等藉口。然而事實上性騷擾的問題卻不斷在重演着，在任何一種職業、身份、階級、民族間重覆的發生，這已非上述簡單的結論可以解決的，讓我們換個視角來討論這個令人不快的話題，從整體社會結構層面來檢視它，我們會發現其背後所隱含的是一個具有性別歧視的意識態，如這個社會正依據這樣的意識形態來規範你我的性別角色。

### 一個縱容男性性慾的社會

人有性慾並不可怕，但創造，縱容進而誇大性慾卻是可怖的。這個A片、黃色書籍、脫衣秀、娼妓……等充斥着的社會是服務於男性的：各種性交場面，性愛邏輯、藥品，是「男性為性活動的主控者」及「男性要勇、壯、猛」等社會意識的表徵；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化的法力無邊，使「性」商品化並且推陳出新。也正因為這些商品是服務於男性的，其中的男性角色是有權力的主宰者，不僅集攻擊性、技術性、持久性於一身，並以女性苦苦求饒以滿足於現實生活中倍受損害的男性自尊，更甚者有性虐待，與小女孩性交、偷窺、強姦為其內容。

隨着商品的消費流通，其中的性邏輯及性別角色也隨之流傳，在工商社會中男性所受之壓抑或者可因此而得到疏解或轉化，但是在這

樣的性邏輯中，女性被視為性物般的描寫，已扭曲了性的真義，性別角色及其權力結構亦在其中被醜化和偏差的認同着，於是長短粗細成為男性重要的議題，對女性的認識也僅只於商品中那些說不要就是要的抽象女性，而非現實中女性的性格。

當男性的性慾、性能力被如此誇張和縱容，並成為男性自我的一部份時，隱藏和壓抑性慾是「不可思議」的事，表現它是男子氣概的標幟，因此在生活、工作中對週遭之女性「呈現」它，除了局部滿足自己之外，亦帶有逃逸規範的快感，一展雄風。然而在這樣的遊戲規則中，女「人」不見了，最多以「物」的角色存在着。

父權社會的根深蒂固、男性性慾的誇大縱容以及資本主義的催化，成就了一個有性別歧視的社會意識形態，彼此之間環環相扣，男人不過是這套意識最忠誠的實踐者罷了！

### 女人你的名字是「獵物」

女性作為一個「被觀看者」的角色，是沒有太多自主性的。在以往的「三從」時代，女性是一個附屬品，而無自己的獨立人格；現代社會中除了承受與男性相同的壓力（來自資本主義與工商社會）之外，還要承受父權意識形態的「騷擾」：妳的身體被放在舉目可見的週圍，並擺弄着迎合男性的姿態，黃色書籍、海報、男性藥品廣告、舞台上妳的身軀正在誘人（是男人）的扭動着；妳要留意那些隨身攜



舉目可見的女性肢體是藝術？





帶凶器的男性，曖昧、隱晦或公開、暴力的侵入妳的身體，強暴、猥褻的威脅從未遠離，上司或師長、朋友的手、腳、語言、眼光貪戀着妳的身體，當然即使如此，我們僅稱之為「騷擾」而已。

在這個縱容男性性慾的環境中，女性不諱是一個最佳獵物和重要的「存在」，是男性證明自我能力的利器：愈是抗拒、高不可攀，征服、馴服的趣味性、挑戰性也相對提高。妳不可將自己包的死緊，因為那是暴殄天物，因為妳的身體是「藝術」（可供觀賞的），但又不可穿着暴露以防「騷擾」；妳不可孤芳自賞要大方親切，但不可隨便輕浮，以防男性「誤會」，所以這之間的差距分寸要拿捏好。這個道理如此淺顯易懂，正如同「我們應責難蘋果長得太誘人甜美，而不可怪罪偷竊者起犯意」是金科玉律一般；妳也得保持高度的「幽默感」，以免當男性的眼光看着妳的胸，手放在妳臀時，用語言調侃妳時，誤會或不解風情的作出不良反應，更神奇的是妳必需研發另一套語言，讓男性了解到，當妳說「不」時妳的真意就是「不」，而非「要」。雖然「獵物」不是妳加在自己身上的形象，縱使「隨便」「暴露」到何種程度會引起男性的性慾，並非妳所能衡量控制的，妳依然要小心去揣測這個不是由女性主控的標準，並遵守它，因為這正是獵人／獵物的遊戲規則。

#### 是種社會結構就無人能逃避

男女的差別，在於最後一對染色體不同，而導致生理形態有所差異，其他的男女特質皆是社會化的結果，我們可以如此理解；當生物上性別之差異出現時，就已決定妳這一生大致上的「行為模式」了，是男性則如此如此；是女性則這般這般，這是非常刻板的性別角色分類。從唱着哥哥爸爸真偉大到看Play Boy，教導男性如何在公領域中挺進和認識女性；從唱着妹妹背着洋娃娃到看婦女雜誌，教導女性如何處理私領域的事務和訓練裝扮成為男性樂於獵取之獵物，所以「成功的男人背後有一個偉大的女人」、「男主外、女主內」這樣的男女樣力差異就被定型，這是父權社會運作的邏輯；性和意識形態的商品化並廣為傳播宣揚，是資本主義深化了這樣的邏輯。

正因為這樣的性別角色是種社會結構，因此沒有人能逃逸出如此的運作模式，不因男女的身份、地位、教育程度、經濟能力而轉變。認清它並力求突破是唯一的出路，不要相信或依賴妳的白馬王子不會如此這般，如果妳沒有自覺，他為何要放棄優勢地位？所以成為一個「人」，不要做一個滿面瘀傷的蘋果！

# 校園短波

## 針砭台灣文化

東海台灣文化研究社

「台灣文化研究社」創社至今已一年半了，這段時間對一個草創的社團來說，是艱辛、坎坷的，而許多對於路線及方向上的爭辯，更是極需釐清和確定，才能為未來的目標畫下藍圖。

台灣在解嚴後，反對運動風起雲湧的展開，其中政治、社會運動是主要的一環，在文化上，普遍鄉土意識抬頭，但大多是屬於尋回斷層，過去的台灣文化（亦即「尋根」），我們認為這種本土文化意識的興起確實應該以舊有台灣文化為基礎，但如何與現代的台灣社會連結並共同思考、為現在的台灣文化進行改造，才是真正研究台灣文化的中心議題。

「台灣文化」到底是什麼？一般人概念中想到的，是布袋戲、歌仔戲、鹿港古蹟、台灣小吃……，我們也曾以為如此，但是後來發覺文化的定義太廣也太抽象，如果只知道「文化」的人的生活，而無法將「人」放進「社會」、「歷史」的互動脈絡中看待，則所有關懷或研究的焦點將無法對「現在」及「未來」的「人的生活」有所助益，因為文化是動態的，是辯證發展的過程。台研社的所有活動，包括：研究台語歌謠、戲劇、或文化批判的媒體、廣告、電影、文學等，都是這個理念的延伸；甚至連參觀鹿港的民俗活動（王爺出巡），都不只是看到了鑼鼓喧天的熱鬧或對現代都市以來說不可思議的

乩童，更好奇於當地人民因信仰而自發形成的社區組織是如何運作的；諸如此類的活動一再印證了我們的路線，並使我們更加深刻的看到了文化的內涵，絕對不只是懷舊復古，也非流行商品表現出的膚淺的浪漫鄉土，它其實是殘酷的批判了文化的醜陋面，要大家正視它，並使異化了的人的生活獲得解放。

這些，正是台研社為台灣文化所要做的一切努力。

## 黑水溝的聲音

東吳 周嵩祿

東吳黑水溝社於九〇年三月野百合學運後，於城區部成立，原名台灣文化研究社。繼而於校本部成立分社，二區合併運作。由於環境不同，造成二區台文社，理念及路線漸有差異，且行政運作上不易，故於今年改名。

黑水溝乃早期漢人移民渡海來台，面對浩浩大洋及不可知的未來，而對於台灣海峽的稱號。其歷史意義在於黑水溝乃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不同之分野站。當漢人移民渡過黑水溝之始，也象徵著其為面對新環境，必須把中國風土所養成之大陸性格，一一地拋棄。

黑水溝的改名，也代表著社團的立場及路線的確立，如上所述，台灣乃一主權



Play boy—男人的極樂幻境？



# 校園短波

獨立之國家，其文化乃經原住民、荷蘭、日本、中國等各地文化相互衝激，再加上地理環境影響而自成一格，其島上住民亦為其榮共存之生命共同體，自外於中國大陸而享有其主權，如黑水溝之名般，其為洋流匯集之地，我們也希望藉由社團中各個不同思想背景的人，相互討論並激盪，且本著我們對弱勢團體的支持及參與。凝成一股共識，化為我們的立場，並強調其實踐。唯有實踐，才能檢証我們所思考是否正確，並從中學習，而我們也相信，身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台灣的事絕非獨立發生於此而自外於世界。在資本主義世界下，各國人民其現在或未來所面臨到的問題，都是一樣的，即資本主義階級流動已呈緊張狀態，其所製造出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將會對其生存造成威脅，而我們要做的，就是藉由各種的討論與實踐，促成其瓦解，並尋求解決。

黑水溝這學期讀書會將進行“曼德爾三講”及“一八四四經哲手稿”二書之討論，另一組則為“意識型態與文化的批判”，從各層面文化予以批判並相互衝激。另外尚有時事研討、台語朗誦及古蹟巡禮。配合著改名及新生入學，於十月中旬，我們也將出一份“黑火”創刊號，對於社團活動有詳盡介紹。同時，也將於城區部舉辦影展——台灣社會運動紀錄片輯，探討小眾媒體對大眾媒體的反制及台灣社會運動的過去及未來，也希望這一套紀錄片，往後能於各校陸續舉辦放映。

## 國思社波濤

中山醫學院

中山醫學院生針對校方強徵「空調設備及使用費」抗爭乙事，從九一年八月始至九二年九月退費止，歷時一年餘，在保守的中山校園裡，為學生抗爭立下一個新的里程碑。

九一年八月註冊通知單上，首度出現「空調設備及使用費」八百元列印於代收費項目中，引起全校同學普遍的質疑與不滿，但在校方以不繳納即無法完成註冊手續的威脅下，同學們只得繳費；開學後，數次出現學生的零散抗爭，但都不見成效；國思社亦推動尚在「難產」階段的「全院班代表聯合會」與校方展開正式溝通，但校方僅將班代會議視為收斂同學們不滿情緒的管道，一味敷衍了事。

十月，國思社開始於校園炒熱此議題，然考慮將運動資源累積於班代會議進而推動其正式成立，故以班代會議為台面上發言管道，而社團從旁輔助，但侑於人力，只得打媒體戰，並以「多線發展，單線主抓」為抗爭策略，議題從「空調費」主訴求旁及其他校園問題：廢除代收費、宿舍費用不合理、校園黨部孔識平辦公室退出校園（此為中區各大學之聯合議題）……等。學期下半，同學們不滿情緒逐漸冷卻，校園經營轉至校方溝通。然而最後回頭校方態度突然大變，蠻橫地拒絕成立。此時學期已近尾聲，期末考的功力與校方藐視同學的態度令班代表們頗感無力。在客觀環境逼使下，國思社乃決定尋求校友魏耀乾立委的協助。校友回母校瞭

# 校園短波

解情況後，察覺班聯會的成立事宜其幕後尚有多雙黑手操縱，無法單由教育行政系統解決。而空調費、宿舍費及代收費三項議題便由國思社將資料備寄後委校友代轉至教育部。

次年春，收到教育部責成校方退費與其他議題之答覆，國思社除刊行快報帶起高潮外，並再度運用班代會議為檯面管道逼迫校方正式答覆。至此，班代會議被視為策略性運用的機構，而不再有長期經營的考量。五月中，校方的申覆被勒回，退費的抗爭終漸緩慢。及至九月註冊時，總務處關卡人龍長排，退費乃成事實。國思社合理抗爭的模式也深烙在同學心中！

## 法商青年社簡介

因為不願做思想作的巨人，行動的侏儒，所以我們堅持從實踐中自我批判自我改造；因為不願踩在人民背上讀書所以我們主張放下身段和人民站在一起。

青年社的歷史就像一幅台灣社會變遷史的縮影，他的發展再再反映出，台灣人民從倍受壓迫的不自覺到自覺，到起來抗爭的歷程。青年社最初是個校刊社——一群知識份子關在象牙塔內風花雪月，直到一群學姊長們自覺到言論自由的倍受箝制，校方任意以審稿制度踐踏學生尊嚴……等不合理的宰制於是起而關心校園問題及大學體質，從事學生會的參與、競選。從實踐的過成中更進一步體認到，大學只不過是受黨國體制下，從事意識型態控制的一環，和整個社會的政經結構是環環相扣，不可分割的。要解決校園問題唯有勇敢站出來向惡質的大體制挑戰才能達到斬草除根的效果。於是青年社質變為運動性。同樣地，在實踐過程中擴大了我們視野，加深了對問題的認識。台灣人民除了受外來政權的蹂躪，在資本主義文化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勞工受資本家的剝削，階級矛盾昭然若揭。我們一本初衷地堅持和廣大的無產者站在一起。

一個社會中的青年，如果沒有批判的精神，澎湃的行動力，那社會的就是在訓練自己的戰鬥能力，成為社會改革的先鋒。



## 編輯後——

讓大家久等了，通訊終於出刊了。

學生運動，一直是曾為學運幹部的我們所關切的主題，學運的未來發展趨向，透過本刊舉辦的「學運幹部座談會」，希望是顯現在校園中學運幹部的思考輪廓。學生運動一直有其內憂外患的兩極困擾；對內組織難以強化，對外（社運、政運）難以維持聯盟關係；內、外不夠嚴謹處理的困擾，總是兩把利刃，切在學運的腹背。如何在兩把利刃中拿捏準確立場原則，而不是因兩面困境，卻各自採取派系路線的區分歸類！「“派系”本位思考」一文即在解說現在學運內部派系只是人際關係間無意義的磨擦爭議罷了！派系之分也得放在立場上的辯證，才能展現在運動中組織與聯盟的意義。

對立即發生的事件，通常我們容易被媒體以及官方資訊所迷障，然則如何予以實踐性的架構分析，透視事件歷史的客觀迷障，而有成熟的立場論述，常是在運動過程中所難以掌握及缺乏的。本期的幾篇文章「反賄選的流行光譜」，「二次土改」、「基本工資調整」，企圖對立即事件，解說其真正的背後面貌。「一場獨缺人民行動的鬥爭」，則分析了國民黨統治的新型態，不再單純由主流／非主流的權力鬥爭，背後所隱含的是資本主義深化時利益爭奪問題，土地改革只是鬥爭的藉口，真正受害的依舊是人民。

特稿部份則有女性主義的「性不性由不得你」；誠然女性主義已由「人權」論述進步到「後現代」觀點，然則處於剛從傳統過渡到資本社會的台灣，其性別不平等的權威意識仍廣泛潛於底層社會，是故，如何使女性主義進入實踐的論述範疇，本文企圖由性騷擾的廣泛存在，切入討論女性運動如何可能！

本刊開闢「校園短波」園地，各校學運團體可將此園地視為交流的平面空間，藉以向社會傳達訊息，各校團體來稿內容不拘，可以是內部組織的思考、校園情況報導，或個別抗爭事件始末，或請求援助……。於此，在下一期本刊也將設「社運報導」，也期社運團體來稿參與。

創刊號，可能承載着一個紀元的開始，也可能是上個紀元沒落的結果；總之，一個園地的刊物空間，只要有關於實踐的、運動的，「野百合」永遠向您開放。